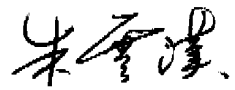


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



高度一元化秩序及其建構者

從世紀末國際社會所發生的各種重大事件所透露出來的趨勢來看，下一個世紀的世界秩序的主要形貌似乎已經隱然可見。這個世界秩序最基本的特徵就是一個同時貫穿安全、生產與交換、金融以及意識形態四個領域的高度一元化權力結構，而建構這個一元化秩序的主要行動者就是美國^①。

在後冷戰時期，美國挾其無遠弗屆的軍事投射能力，以及憑藉她與西歐國家所建構的集體安全體制，成為唯一具有建構全球安全秩序以及介入區域衝突能力的單級超強。同時，美國憑藉其國內市場的超級規模以及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在全球資本市場的舉足輕重地位，成為推動全球貿易體制與金融秩序變遷的主要遊戲規則制訂者。這個後冷戰安全秩序建構的主軸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擴與安全任務的調整；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的主要政策協調機制是七國工業集團(G7)的高峰會與財長會議，主要的執行機構是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貨幣基金會。這個高度一元化權力結構的出現，與後冷戰時期全球體系所出現的權力的真空狀態有密切關係，而且此一真空狀態可能仍會維持很長一段時間^②。

這個一元化的意識形態結構，設定了一些基本規範準則：第一、西方國家的民主與人權實踐範式成為檢驗各國國內政治秩序正當性的唯一準繩(但民主原則被排除適用於檢驗國際政治秩序的正當性^③)；第二、維護私有財產權、鼓勵自由競爭與尊重市場運作機制同時成為國內與國際經濟秩序建構的金科玉律；第三、根據排他性地域管轄性的主權國家仍舊被視為組織人類政治生活與分割政治權威的基本單元，但跨國性組織與團體在全球事物管理上的發言地位獲得一定的承認^④，以及境外的政治行動者得以人權的理由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的正當性也獲得支持^⑤；第四、透過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途徑處理全球事物與

下一個世紀的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徵就是一個同時貫穿安全、生產與交換、金融以及意識形態四個領域的高度一元化權力結構，而建構這個一元化秩序的主要行動者就是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美國憑藉其國內市場的超級規模以及在全球資本市場的舉足輕重地位，成為推動全球貿易體制與金融秩序變遷的主要遊戲規則制訂者。

國際衝突成為一種常態模式並受到肯定，但多邊主義的整合範圍是以意識形態近似性為主要考量^⑥。在這個新的世界秩序中，十七世紀以來威斯特伐利亞體制下的絕對主權觀受到了明顯的挑戰，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經濟秩序重建時所遵循的鑲嵌性自由主義 (embedded liberalism) 原則^⑦也遭遇嚴重的侵蝕。

這個一元化的意識形態結構是以特定的世界觀、特定的人類歷史發展目的論作為其理論基礎的。以個人自主、自我管理與自我負責的原則作為組織社會生活的基本前提被塑造成為一種「自然秩序」；由代議民主、市場經濟與市民社會構成的三位一體結構被視為歷史演進的必然終點，也是評估所有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進步與落後的準繩；以股東利益至上的英美式資本主義 (Anglo-Saxon capitalism) 被普遍接納為最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模式，也被視為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適應新的國際競爭環境重組國內生產關係時所必然模仿的對象；在運輸成本下降與通訊科技突飛猛進，阻礙資本、貨物與資訊進出國境的各種人為障礙的消除，以及市場整合與國際分工所創造的巨大經濟效益等因素推動下，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趨勢無可逆轉，所有國家都必須服膺此一潮流^⑧。

這個霸權結構的超穩定性在人類歷史上可能是空前的。在意識形態領域，當前幾乎沒有任何能與之抗衡的替代模式，東亞的發展性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 資本主義模式^⑨以及西歐的利益關係人資本主義模式 (stake-holder capitalism) 正面臨英美式資本主義的嚴峻挑戰^⑩，新馬克思主義與古典社會主義的論述陷入空前的邊際化危機，「東亞價值」的論述與回教基本教義都只是消極的防禦，後現代的論述只能構成一種微弱的挑戰，但無關宏旨。在物質基礎的再生產過程中，美國大學與企業不斷吸納全世界最優秀的科技人才；美國金融市場不斷吸引全球的低成本資金，國際市場貿易競爭的遊戲規則更是圍繞着美國最具競爭優勢的產業 (尤其是資訊科技、生物科技產業與金融服務業) 而設計，因此這些機制不斷支撐着一個「強者恆強」的正面循環。

美國金融市場不斷吸引全球的低成本資金，國際市場貿易競爭的遊戲規則更是圍繞着美國最具競爭優勢的產業而設計，因此這些機制不斷支撐着一個「強者恆強」的正面循環。東亞的發展性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以及西歐的利益關係人資本主義模式正面臨嚴峻挑戰。

反思影響未來的三個前提

在面對上述這樣一個隱然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大陸、台灣與香港應該何以自處？能夠扮演何種角色？這個新世界秩序是必然將兩岸關係導向衝突，還是導向和解？當我們在思考「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這個大課題時，東亞金融風暴激發我們必須對過去經常視為理所當然的三個前提作出更深刻的思考。第一個前提是，東亞的高速經濟成長模式是否能夠恢復並持續？東亞是否仍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的重心？「太平洋世紀」的前景是否已經破滅^⑪？第二個前提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浪潮是否無可逆轉？自由市場機制是否仍將會推動各國政治與社會結構轉型，以及塑造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的主導力量？第三個前提是，全球化過程是否只可能前進而不可能倒退？一個高度整合的全球經

濟體系的出現，是否意味着主權國家的作用與地位將日益下降，以及國家機構經社職能的減縮？

對於第一個前提，個人的淺見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大多數遭金融風暴襲擊而受到重創的東亞國家，都可以在兩三年內恢復經濟成長動力，因此東亞地區的整體經濟實力，仍將在下一個世紀初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不過東亞國家在未來將面臨更嚴峻的國際市場競爭壓力，也不可能一直在經濟增長方面維持獨佔鰲頭的地位。個人對於東亞的經濟前景基本上仍然樂觀，是基於以下的結構性考量：第一、這次金融危機的本質是過度投資而非過度消費，矯正過度投資（以及衍生的泡沫經濟現象）的政治難度要比矯正結構性的過度消費容易；第二、大多數東亞國家仍具備有利於長期穩定經濟增長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對外導向的經濟體制、高儲蓄、重視教育投資、家庭的互助功能、靈活的經濟組織等；第三、大多數東亞國家的政府雖然存在腐敗與僵化的問題，但依然具備較高的調動社會資源與引導經濟結構調整的能力，以及相對於特殊利益團體仍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因此，在可遇見的未來，東亞勢將成為與北美及歐洲並駕齊驅的全球三大經濟板塊之一，而且必將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基地。在東亞經濟板塊中，由台灣、香港、大陸以及東南亞華人經濟網路所構成的大中華經濟圈，將比日本更有機會成為帶動下一個世紀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在過去二十年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積極向世界各地推銷經濟自由主義，實際上卻等於是建構一個無政府狀態下的超級賭場。因此，世界秩序建構的新課題將是如何控制全球資本主義的不安定因子，節制其潛在的破壞性力量，特別是如何重新讓市場制度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服務，而非讓市場機制反客為主。

個人對於經濟自由主義浪潮的前景則有很大的保留。因為東亞金融風暴的爆發、惡化與蔓延所反映的問題，不僅僅是國際間對於全球化資本市場與跨國資金流動的監督、管理與政策協調的合作機制不足，而且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後所無法避免的脫序與危機。正如博蘭尼 (Karl Polanyi) 對於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結構性原因之分析曾指出：市場制度從來就不能凌空於社會與政治制度之外而穩定運作，當市場機制的運行超脫任何主權國家或國際權威性機構的掌控時，當各國的預算、貨幣與財稅政策必需隨着國際投機客的魔笛起舞時，資本主義本身的脆弱性與破壞性本質即可能成為經濟秩序動盪的根源^②。人類似乎永遠無法牢牢記取歷史教訓。90年代西方社會主流思潮對於經濟自由主義的堅持，與本世紀20年代西方社會對於自由市場的崇拜如出一轍。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過去二十年間，積極向世界各地推銷經濟自由主義，強迫各國打開國內市場與解除金融管制，為歐美國家的閒置資金創造一個無疆界、無障礙與無時差的供需市場，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為追求生產資源在全球規模上最有效的配置，但實際上卻等於是建構一個無政府狀態下的超級賭場，這個賭場內的主要賭客是全球避險基金，賭注是各國的經濟命脈、社會制度與文化體系。而世紀末的全球金融危機正適時的提醒全球人類，新世界秩序的建構不能單單以效率、利潤與競爭力為經緯，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建構新的政治與社會機制來駕馭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市場機制的破壞性力量遲早將引爆各種飽受流離顛沛之苦的社會力量的全面反撲。因此在世紀之交，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可能已經達到其階段性的發展極限^③，在下一個世紀的初期，世界秩序

建構的新課題將是如何控制全球資本主義的不安定因子，節制其潛在的破壞性力量，特別是如何重新讓市場制度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服務，而非讓市場機制反客為主。

對於全球化過程的動向，很難做概括性的預測。因為全球化此一概念的內涵十分廣泛，它同時指涉多個層面^④，而且有狹義和廣義之分。事實上，狹義的全球化過程與前面所談的經濟自由主義浪潮形同表裏，因此其前景是不確定的。廣義的全球化所指涉的革命性世界秩序變化，既過於樂觀，且過於超前。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過程是相當無秩序、相當不均衡的，具有高度的歷史偶然性，其中更充滿了緊張與不協調，而且並非一種全新的歷史經驗。首先，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對第三世界絕大多數人民的經濟福祉不但毫無助益，反而帶來更大的不安全。在90年代，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生活條件與科技水準的差距日益懸殊，第三世界有更多人陷入絕對的貧窮。再者，就以全球經濟活動的整合程度而言，在貿易、投資與資金流動等指標上，西方國家的經濟互相依賴程度並未超過以往的歷史最高水平。今天的國家間的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當然明顯比60或70年代高，但未必超過20年代，在跨國人口流動方面更遠不如十九世紀來得自由。換言之，我們並不能斷言，全球經濟的整合過程已經邁入無可逆轉的境界。其次，在後冷戰時期，全球性議題的能見度雖然不斷提高，但有效處理這些議題的國際合作架構或全球性管理機制的出現仍遙遙無期。陳義過高的全球意識仍敵不過根深柢固的國家利益。尤其是居於唯一超強地位的美國，對於強化既有的國際合作機制，顯得興趣缺缺；在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內（例如國際貨幣基金會、聯合國安理會），美國經常單方面扮演強勢主導的角色，因此大幅削弱了這些國際機構的道德正當性。在文化認同的領域，全球化的過程往往伴隨着部落化（tribalization）過程一同出現，兩者相激相蕩。而在第三世界，全球化往往是美國化（或西化）的代名詞，導致嚴重的本土文化認同失落的危機，所以第三世界要求價值多元化的聲浪將不斷上升，雖然這未必導致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謂的「文明衝突」^⑤，但也絕非單一方向的融合。所以整體而言，一個真正的全球社群的出現仍是紙上談兵，文化與價值的趨同未必平順。主權國家仍將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政治與文化組成單元，主權國家對世界秩序的塑造仍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處理全球性議題上，由於各自囿於狹隘的國家利益，主權國家也許成事不足，但絕對敗事有餘。當前主權國家的主要不足在於各自的市場規模過於狹小，因此將會透過區域經濟的整合，來擴大彼此的經濟成長空間與強化國際競爭力。所以真正有可能部分替代主權國家職能的，將是類似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這一類的區域經濟統合組織，成為界定世界經濟版圖的新坐標。

總之，兩岸三地的知識份子在面對全球化的趨勢時，必須對於三個迷思保持自主判斷的能力。第一個迷思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浪潮無可逆轉；第二個迷思是，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體系裏，主權國家的作用與影響必然日益消退，國家的經濟職能必然衰退；第三個迷思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人類社會在經濟

今天的全球化過程是相當無秩序、不均衡的，更充滿了緊張與不協調。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使第三世界有更多人陷入絕對貧窮；在文化認同的領域，全球化往往是美國化的代名詞，導致嚴重的本土文化認同失落的危機。所以，一個真正的全球社群的出現仍是紙上談兵，文化與價值的趨同未必平順。

組織、社會制度、價值觀念、歷史記憶、認知地圖、文化認同上將必然出現融合與趨同。

判斷與抉擇

在對這三個大前提做出初步的結論後，我們將進一步嘗試回答三個相關連的問題。第一，在下一個世紀中國人社會的發展藍圖可能而且應該是怎樣的？第二，大陸、台灣與香港對於下個世紀的世界秩序的建構，特別是全球管理機制(global governance)的建構，能夠而且應該發揮甚麼作用？第三，兩岸三地中國人在東亞的安全與經濟秩序的建構過程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

第一個問題十分緊要。因為國內秩序與國際秩序的建構本來就是相互牽引的，享受領先優勢的國家對於國際秩序的主張，必然以維護既有的國內秩序為重要的考量；力爭上游的國家必然以維護其發展空間為出發點。而佔全世界人口將近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所追求的社會制度(即國內秩序)，必然深刻影響到世界秩序的建構。

中國大陸現在尚未開展明確的未來圖像，但可以確定的是，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的挑戰，還不完全在於產權的配置，而是如何設計一套相應的政治體制，既能整合市場經濟內新生的多元社會力量，又能結合資訊社會的來臨。台灣、香港與新加坡在未來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將提供許多正面的和負面的示範。

中國大陸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摸索，尚未開展一個明確的未來圖像，但可以確定的是，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的挑戰，還不完全在於產權的配置，而是如何設計一套相應的政治體制，既能整合市場經濟內新生的多元社會力量，又能結合資訊社會的來臨。毫無疑問的是，台灣、香港與新加坡在未來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會起重要的示範作用。但這三個中國人社會不單提供許多正面的示範，也提供不少負面的示範。因為在下一個世紀，日本、台灣與韓國的政經發展模式將面臨更嚴峻的轉型挑戰。過去這三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都具有「發展性國家資本主義」的特質(程度或有不同)，國家機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僅扮演了促進的角色，而且發揮了主導性作用。國家機構對關鍵性產業進行保護與扶持時，政府部門刻意忽視短期的市場資訊，選擇性的開放國外市場的競爭壓力；在對特定產業進行市場秩序的管理時，也是刻意抑制市場競爭機能的短期作用，政府的政策不是被動地依循比較利益，而是主動地創造與更新一國的比較利益。同時，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介入，也不僅止於引導資金與技術在產業間的流動，而且還直接介入生產關係(勞資關係)的運作，以及對消費與儲蓄行為進行政策性導引。但此一發展模式對應的內外政經條件已經出現劇烈的改變，因此必須改弦易轍。但這並不意味着，東北亞的政經結構必須向英美式資本主義靠攏，東亞國家在適應全球化的趨勢過程中，必然會在既有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下找尋適合自己發展階段的模式，必須在全球化潮流衝擊下維護與掌握自己社會發展的主體性，因為本來就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政經模式^⑥，同時東亞國家的結構調整方向也未必是朝向減縮國家經濟職能的單一方面^⑦。未來東北亞必須在適應新的全球化經濟體系的前提下，重新界定國家的經濟發展角色，重新設定政府的經濟社會職能，以及重新安排產業與政府的

政策協調機制，其關鍵在於如何能根據東北亞國家的生態條件與社會結構特質，建構一種民主的發展國家模式^⑧，同時兼顧經濟政策的民主參與與產業的永續經營。

第二、當前的全球管理體制有很大的局限性與明顯的偏頗。在後冷戰時期，美國作為全球唯一超強在處理國際事務上所表現的獨斷作風，更削弱了現有國際合作體制的正當性。聯合國安理會幾乎淪為為美國選擇性軍事干預的背書工具，國際貨幣基金則完全以美國財政部的觀點馬首是瞻。美國既不願意增強現有國際合作體制的功能，又反對建構新的補強機制。國際貨幣基金在東亞金融風暴中的表現，尤其令人感到寒心。國際貨幣基金幾乎成為西方金融資本家的工具。國際貨幣基金的所謂「紓困方案」，完全是以確保西方國家債權人機構（跨國銀行與投信基金）的利益為出發點，不惜摧毀許多東亞國家長年的經濟累積成果，以及扼殺經濟快速復原的生機。同時，還以吸引外資重返新興市場為名，要求東亞國家更大幅度的開放外資進出資本市場的限制，使得先進國家的金融資本家可以進一步在受災國家資產賤賣的過程中獲取利益^⑨。同時，美國為維護國際貨幣基金在金融紓困領域內的獨佔地位，堅決反對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的提議，而大陸當局也缺乏遠見而加以杯葛。東亞金融風暴更充分暴露了當前國際合作機制的缺陷與偏頗，當前的全球管理機制並不真正符合多邊主義精神，充其量只是主要西方國家之間的小型多邊主義的產物（mini-lateralism），這又以七強高峰會的設計最為露骨。

由中國大陸、台灣與香港在東亞金融風暴中所扮演的中流砥柱角色來看，兩岸三地在下一個世紀全球管理機制的改革問題上是必然有發言地位的。中國人在面對世界秩序的建構的大課題時，可能既要把握維護國家利益的傳統性思考，也要掌握中國人所擅長的全局思維與辯證思維。如果中國大陸只是一心一意以推動「多極化」來牽制與削弱美國的超強地位，而忽視全球化過程所帶來的挑戰與機會，那也是缺乏前瞻性的做法。大陸當局要在世界秩序的建構過程中發揮應有的影響力，應該是以落實真正的「多邊主義」為訴求主軸，而非沉浸於權力均衡的遊戲，要提振「多邊主義」的精神就必須先從強化華人經濟圈在東亞地區的道德領導地位着手。

第三、中國大陸在提昇其在全球管理機制建構上的發言地位時，並不能將力量只用在發展與美國雙邊關係的一條主軸上，而忽視了推動東亞地區更緊密合作關係的工作。兩岸三地必須先積極參與東亞地區新秩序的建構，才可能具備引導世界秩序演變的條件。因為在下個世紀的初期，全球管理機制的建構必然是透過北美、歐洲與東亞三大經濟實體間的協商與合作來達成，而這三大經濟板塊中，北美與歐洲都具備一個經濟實體所需要的政策操作機制，唯有東亞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缺乏緊密的協調與合作機制。在此一結構限制下，儘管東亞可能仍是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體系內成長最快速的地區，可能仍將是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生產基地，但卻不可能取得相應其經濟實力的全球事務發言地位。

大陸當局要在世界秩序的建構過程中發揮應有的影響力，應該是以落實真正的「多邊主義」為訴求主軸，並不能將力量只用在發展與美國雙邊關係的一條主軸上，而忽視了推動東亞地區更緊密合作關係的工作。兩岸三地必須先積極參與東亞地區新秩序的建構，才可能具備引導世界秩序演變的條件。

在東亞政治經濟秩序重建過程中，最為迫切的課題是如何建立區域貨幣穩定機制，讓東亞國家在貨幣政策、金融管理與匯率政策上加強合作。當然，經濟合作必須要以政治和解為基礎。如果兩岸間能夠突破目前的政治僵局，建立過渡性的政治框架，下個世紀東亞區域的穩定與繁榮的前景將大為改觀。

兩岸三地在積極參與東亞新安全與經濟秩序的建構時，不能忽視日本的巨大經濟實力以及軍事潛力。戰後歐洲的整合過程的政治基石是德法合作，而下一個世紀東亞新秩序最大的潛在障礙是中國大陸與日本的爭霸。要避免爭霸格局對東亞區域以及兩岸關係帶來的危險，要靠兩岸的和解與合作，而無法對日本的政治領導角色有不切實際的寄望。日本的島國心態，已經多次讓其失去在東亞地區扮演領導者角色的機會。中國人必須在日本所犯的歷史錯誤中汲取教訓。日本今天陷入經濟泥沼，而且成為東亞經濟的拖累，可以說是咎由自取。日本遵行重商主義的結果是：對國內市場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使日本的服務業部門變得非常無效率，拖累了整體經濟，而且衍生成為金權政治滋長的溫牀；對東南亞國家採行的技術保護主義，限制了東南亞國家工業升級的空間，使得他們在面對中國大陸廉價勞工的競爭壓力下，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所以未來中華經濟圈要承擔領導東亞經濟合作的責任，就必須以市場開放的原則來確立領導地位，必須以資本與技術輸出來引導區域內的合理經濟分工。大陸在市場開放方面的努力最為關鍵，台灣與香港則在資本與技術輸出方面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在東亞政治經濟秩序重建的過程中，最為迫切的課題是如何建立區域的貨幣穩定機制，讓東亞國家在貨幣政策、金融管理與匯率政策上加強合作。事實上，兩岸三地加上新加坡與日本，這五個經濟體合計所擁有的外匯存底高達六千億美金，本來就應該在國際金融管理體制的問題上享有較高的發言地位，而且即使在美國不參與的情況下，自身的金融實力也具備建構東亞地區貨幣穩定機制的條件。

經濟合作必須要有政治和解作為基礎，經濟合作很難在參與國家對於安全秩序缺乏基本共識的情況下出現。未來東亞區域穩定的關鍵在中國大陸與日本的政治關係，而北京與東京關係的關鍵在台灣。台灣可以扮演激化大陸與日本矛盾的角色，但也可能發揮促進大陸與日本政治和解的功能。如果兩岸間能夠突破目前的政治僵局，建立過渡性的政治框架，下個世紀東亞區域的穩定與繁榮的前景將大為改觀，區域經濟合作的政治基礎將日趨穩固。因此，兩岸在建構東亞地區新的安全與經濟合作機制上責無旁貸。兩岸更應該在這個大格局下重新思考彼此的共同利益，以及彼此因為長期政治對立所付出的巨大機會成本。

註釋

① John G. Ruggie, *Winning the Peace: America and World Order in the New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8).

③ 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④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⑤ Kathryn Sikkink, "Human Rights, Principled Issue-Networks, and Sovereignty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no. 3 (1993): 411-42.

⑥ John G.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 3 (1992): 561-98.

⑦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International Regime*, ed. Stephen D. Krasn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195-231.

⑧ 對於全球化的必然性之代表性觀點，可參見William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⑨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⑩ 有關利益關係人資本主義模式，指的是企業的營運不單純以追求股東 (stockholders) 的最大利益為目標，也同時兼顧其他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s)，例如公司員工、社區、顧客或上下游廠商等。參見Suzanne Berger and Ronald Dore, eds.,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⑪ Mark T. Berger and Douglas A. Borer, eds., *The Rise of East Asia: Critical Visions of the Pacific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⑫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⑬ Robert Boyer and Daniel Drache, eds., *States Against Markets: 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⑭ 對於「全球化」概念的各種不同理解與使用，可以參考 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⑮ 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以及王緝思主編：《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論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⑯ 同註⑩ Suzanne Berger and Ronald Dore。

⑰ Linda Weiss,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⑱ 有關民主的發展國家的概念，可參見 Mark Robinson and Gordon White, eds.,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⑲ Robert Wade, "Lessons from the Asian Crisis" (paper presented at a seminar on "Is this the end of the Asian Model?", hel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3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30 April 1999).